

# 为多孩家庭配租公租房 鼓励生育需要 实惠

## 禁止收集家长职务信息该成为明规则

□ 土土垠

近日,有广西南宁网民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建议禁止中小学收集家长工作单位和职务信息。南宁市委办公室回复称,家长民族、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不是必填项,家长可自愿填报。

今年8月,已有网友建议禁止中小学幼儿园收集家长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北京市教委回应称,该信息只用于学籍管理,严格保密,不对普通教师公布,北京市教委正在研究取消父母职务信息的收集。

家长为何对学校收集职务信息如此在意?是因为这一行为关乎教育的公平感。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学校围绕学生了解相关信息本是工作需要,可是,学生家长的工作、职务跟学生学习和没有直接关系,有什么必要了解呢?

相反,学校收集这些信息,家长难免担心教师会不会“看人下菜碟”,对那些职务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孩子格外照顾,而对另一些孩子则忽视甚至打压。此前,天津一教师就曾公开在课堂上宣称:“别怪我瞧不起你,同学的妈妈一年挣的钱都比你妈妈50年挣得多,你们素质是一样的吗?”以往送到我班里的学生,全都是家长当官的,要不就是家里条件特别好,明晃晃的歧视言论令人气愤,也深深刺痛了公众的神经。

当然,缺乏师德的教师毕竟是极少数,也并不是说收集家长职务信息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些“画饼”教育公平埋下了隐患。这也是为什么公众谈到类似话题时,屡屡表示反对的原因。2019年,深圳一幼儿园布置家庭作业,要求孩子拍摄“我家的汽车”照片,引发网友热议;去年,西安一小学校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或社保,被网友质疑是“因材施教”还是“因材施教”的变种,无非都是源于对教育公平的坚定维护。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今天,我们更应该明白,让教育资源公平地惠及每一个学生,应该是不懈追求的目标。收集家长工作单位和职务等隐私信息,对教育的帮助不大,带来的隐患却不小,停止收集明显利大于弊。

家校关系本就因为关系到孩子的未来发展而格外敏感。维护和谐家校关系,就要努力去除横亘在家长和学校之间的不信任因素,别让无关紧要的信息成为影响教育的绊脚石。当然,老师在家访或私下交流的过程中,得知家长的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也完全可以理解,不必太过敏感。但是,学校统一以填表等形式收集这些信息,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在回应中,南宁市委办公室表示,家长民族、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不是必填项,北京市教委表示该信息严格保密,不对普通教师公布,实际上也是认同了这些信息在具体教育过程中并没有影响。既然如此,何不明确规定学校不得收集家长职务等敏感信息呢?促进教育公平,这就是值得往前走的一小步。

□ 朱昌俊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发布公告,优先向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轮候家庭配租公租房。此前,北京市住建委于8月印发《关于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资格审核及分配管理的通知》,其中明确:“为落实国家政策,对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可以免去轮候和摇号,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组织选房。”

三孩政策放开后,构建与之相适应的配套生育支持体系,一些地方已经有所行动。在北京之前,四川攀枝花、甘肃临泽等地,都提出要“对二孩、三孩家庭发放生育补贴或购房补贴”。北京对首批多孩家庭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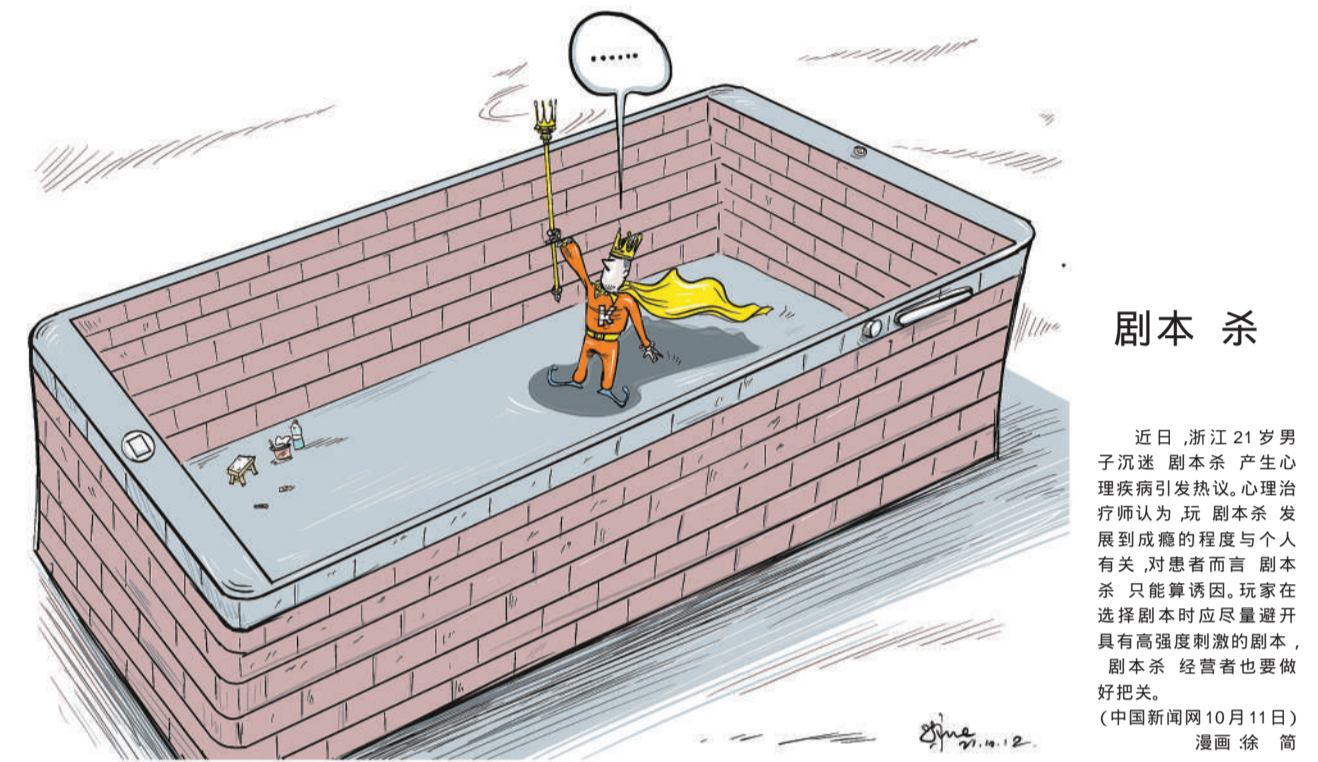
接配租公租房,则是全国首个在公租房分配上向多子女家庭倾斜的城市。从发放补贴到配租公租房,各地有关部门的种种举措,预示着政府以“实打实”的方式鼓励生育,正在成为现实。

当前,育龄夫妇生育焦虑的主要来源,就是对生育成本的顾虑。抚养成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对有意生育的年轻人而言都是不容小觑的“拦路虎”。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侧重,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住房问题可能是最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因素之一。因此,北京提出为多孩家庭配租公租房,相当具有针对性。据统计,目前北京市公租房轮候家庭中,拥有两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共有近

3000户,是个不小的群体。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需求,既能释放鼓励生育的态度,也是有利民生的务实之举。

对于大城市的住房问题,有关部门早有关切。近几年,各地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明显加大。今年7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就明确要求,“要增加公共租赁住房供给,鼓励地方探索更好的经验,下大力气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相关政策主要惠及对象之一就是育龄青年。加强对育龄青年的住房保障力度,并为已经生育的家庭提供直接的福利,自然能减少他们的生育顾虑。”

社会的生育观念,除了受到生育政策的影响,也与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有关。



## 剧本杀

□ 姚华松

2013年8月,我去德国科隆参加一个会议,会后顺便游历了德国、荷兰和比利时三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空旷的广场或草坪上,时不时邂逅一些小动物,它们丝毫没有表现出对人类的惧怕。广场是人们愉快交流的场所,也是动物撒欢儿的地方。之所以出现这种动物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场景,那是因为长久以来,人类与动物互相把对方当作朋友。这种彼此间的认知,以及此种认知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诸多实践和相处方式,决定了环境是公用的、共生的、共享的、共治的。环境既是人类的,也是不同生物的。

2021年7月,一群西双版野生大象一路北上的消息备受关注。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些大象怎么啦?它们怎么会选择离开栖息地,转而入侵人类的地盘了?这种疑问的前置性假设是:保护区是你们大象的地盘,广大都市与乡村地区是我们人类的地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互不打扰。换言之,大象的环境和人类的环境是相互隔绝的。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动物尤其是大型动物只在动物园里待着,珍稀植物生长在植物园里,我们想看动物或植物,就得去动物园或植物园看。

其实不然,良好的人地关系提倡人与动植物的和谐共生。

理论层面,我们经历和见证了仿生学学科的诞生,近年来城市发展倡导的荒野化(wilding)与再野化(rewilding)等概念备受关注。实践层面,利用城市屋顶空地种植稻菘、花卉和其他绿植的城市花园发展得如火如荼,倚靠城乡接合部相对便捷的交通与独特的田园资源衍生出的自然教育方兴未艾。

## 杜绝“画饼”招商,政府与企业要厘清边界

□ 周俊生

近年来,内蒙古部分地方在招商引资、工程建设等方面频频出现政企纠纷,有的甚至闹上法庭。当年政府热情招徕的外地客商,最终成了地方上不受欢迎的对象,由“金凤凰”沦为“落毛鸡”。(《经济参考报》10月11日)这种情况,既伤害了企业的投资热情与合法权益,也败坏了地方政府的公信与形象,其结果无疑是两败俱伤。

对于这种情况,地方政府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些地方资源禀赋较差,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外地投资的期待也更高。为了吸引外地投资者,这些地方政府常常推出各种优惠条件,如税收减免、土地供应等,给投资者画出又大又香的“饼”。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越来越健全的当下,地方政府突破法律法规自由裁量的空间几乎已经消失,很多所谓的优惠政策,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落实,不

过是地方政府为了拉到投资开出的“急就章”。外地客商一旦把这些优惠条件吸引进来,便埋下了后续矛盾的种子。

不过,仅仅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身上,也不完全客观。对此,投资客商同样有自己的责任。不必讳言,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国家吸引外国投资,还是地方政府吸引外地投资,都有政府开出优惠条件引资的因素。但是,这种模式虽然“好用”,对于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只能在一定阶段发挥效用,不可长期维系。过度依赖定向优惠,不仅容易造成官商一体的腐败现象,也会在外来企业和本地企业之间造成不公平,不利于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这种模式基本已经废止。但是,一些企业未能跟上市场前行的步子,依然沉湎在可以靠政府“开小灶”赚大钱的旧环境里,热衷于和地方官员“升华感情”,盲目投资项目本身却缺乏深入调研,这种盲目性很强的投资,遭

遇失败也是难免的事。

今天,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规范,市场经济转轨基本完成。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还应更多将精力投入监督和服务市场主体上,而不是越权“画饼”。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还需高屋建瓴,致力改善本地营商环境,使其成为面向所有企业的“投资宝地”。对于企业来说,决定一个投资项目,也要对相关法律有充分研究,不可“轻信”地方政府开出的优惠条件。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建立亲清政商关系,政府有责任,企业同样有责任。外地投资商从“金凤凰”变成“落毛鸡”的事,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政商关系缠夹不清产生的后果。要改变这种状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和企业要厘清边界,政府不能越位承诺,企业也不要指望靠政府关系赚钱。地方政府和企业各站其位,各务其行,双方关系自然能既亲又清,良好的营商环境也能够逐渐建立起来。

## 算法更人性 用户才不透明

□ 徐益彰

订购机票,发现显示的价格和朋友不同,被大数据“杀熟”,视频软件连续推荐符合自己喜好的视频,一刷就停不下来,越刷越上瘾,资讯软件不断显示抓眼球的文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信息来源已经被算法左右。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互联网产品中滥用算法的现象越发常见。一些互联网内容和服务提供者不合理地使用算法,利用收集的用户信息和行为习惯为用户精准画像,并在此基础上为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以获取更多商业利益。

9月2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9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该文件指出,要利用3年左右时间,逐步建立治理机制健全、监管体系完善、算法生态规范的算法安全综合治理格局。

有关部门非常重视算法滥用产生的各方面问题,着手对算法使用展开全面治理。5月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2021年网络清明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表示,治理算法滥用行为属于专项行动的8个方面任务之一。8月27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提出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遵守的规定。

毫无疑问,算法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带

来了诸多便利。借助算法,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挑选更适合自己的那一件,得以在回家时轻松找到一条最通畅的道路。但是,算法使用者会为算法带来价值取向。何时使用算法、如何使用算法、谁来使用算法、对谁使用算法,这些问题使得算法不只是简单的0和1。

例如,当外卖送餐调度算法不只用于提高送餐效率、提升顾客体验,还被用于进一步压缩外卖员送餐时间、不断压缩平台运营成本时,就可能同时侵害顾客、外卖员和商人的权利;当产品推荐算法不只用于为消费者提供符合其口味和兴趣的产品,还被用于精准营销、广告推送时,就可能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内容推荐算法

不只用于为用户提供更加多元的、积极向上的内容,还被用于带节奏、引流、蹭热点等传播场景时,就可能涉及对正常社会舆论的影响和干扰。

在算法时代,算法的使用者能够借助计算机的强大算力、大数据的庞大基础和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通过一行代码和一个个模型占领高地,以上帝视角洞悉普通用户,使得公众在算法面前变得“透明”。这也就奇怪,算法一旦被滥用,可能带来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风险隐患,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治理“非人性”的算法,需要依靠以道德和法律为准确的人性算法。这种“人性算法”,一方面需要外部力量对算法的使用者进行监管,一方面还要通过建立内部约束机制。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有关部门出台各项政策,积极推动算法综合治理,就是在引导向上向善的算法应用,呼吁各大互联网企业及时自查自纠,规范算法应用,制约算法功能,推动算法创新,营造“清明”网络空间。

孩子学习成绩一般,这些孩子在职校拿到大专毕业证后,家里给安排个工作,就可以上班了。

在个人因素上,职业院校学生构成复杂,家庭情况也不尽相同。就学生自身而言,每个人接触到的信息不同,看法也就不同。有外地考进北京的学生,分数线达不到本科要求,无奈选择了职业教育。由于这些学生自身有更好的基础,在学习上也会获得优势。这些孩子中,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目标就是学好技术,将来用一技之长成就人生。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心思从一开始就不在专业学习上。对于他们而言,技术岗位往往不是最佳选择。

结合以上种种因素,目前职业院校学生选择技术蓝领岗位的占比低,是有一定原因的。想要振兴技术工人行业,提高蓝领的社会认可度势在必行。在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不仅要让学生对自己能学到什么、将来能做什么事有清楚的认识,也要让家长和社会看到,技术工人同样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

## 生物多样性就在我们身边

□ 姚华松

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原有主要被动植物占据的自然系统和原有主要被人类占据的人文系统进行有机整合,打破两者之间的隔阂,形成有亲密关系与密集互动的自然人文生态系统。

其实,生物多样性离我们并不遥远,生物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需要睁大双眼,去发现、认识和了解身边的生物世界,并身体力行地增进与生物之间的亲密关系。

维系城市的自然与生态属性。在城市发展与规划过程中,预留相当面积与规模的森林、荒地与空闲地,从而让动植物有足够的生存发展与繁衍空间。

建立自然与生物博物馆。为了让下一代从小树立良好的自然与生物观念,有条件的城市都应建设自然与生物博物馆,除了展出全球范围的典型动植物,可以重点凸显地方性生物种群。认识地方与家园,不妨从认识地方的生物与生态环境开始。

在广大中小学普及自然与生物课程。在原有课程设置基础上,适当加大自然、地理、生物等课程的分量,培养孩子的生物多样性思维与意识。双“减”措施带来了更多空余时间,不妨用寻找身边的生物、探索身边自然奥秘等方式进行必要的填充。

设置生物多样性观察与实习基地。从我国生物种群的区域分布看,整体上,城市的生物多样性逊于乡村,东部发达城市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逊于中西部尤其西南部地区,教育部门不妨在西部省份设立全国性的生物多样性考察与实习基地,在省域范围内选择生物多样性表现良好的山区或丘陵地区设立生物多样性考察与实习基地,从而为青少年开展生物多样性实践活动创造更好的条件。

(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 离开了乡里乡亲 别让老漂族 身心俱漂

□ 夏熊飞

重阳节将至,尊老敬老话题再成热点。近年来,围绕老年人权益保护,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老漂族。老年人到下一代居住的城市生活,也帮助年轻人解决照顾孩子之类的问题。对老漂族而言,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和福利,尚存在一定障碍,同时,隔代抚养孙辈也面临很大的压力,他们的退休生活并不轻松。

老漂族与年轻的漂泊一族相比,虽然少了经济上的压力和负担,但由于年龄偏大、社交受限、数字鸿沟等问题的存在,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其实面临更大困难。可以说除了背井离乡之外,他们在心理层面的漂泊感、孤独感更难得到排解,往往成为“身心俱漂”的群体。

以笔者为例,岳母从今年8月下旬开始从湖南省岳阳县到长沙市帮忙带外孙女,尽管我与爱人已经有意识地减少老人背井离乡的漂泊感,但我们上班回来又要接手带娃,与老人的交流难免有限,很多时候老人只能通过看看手机、与老家朋友打电话来消磨时间,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有效陪伴和慰藉很有限。

离开了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进入了“对门不识”的陌生城市,白天基本都在带娃,晚上也没有认识的朋友一起参加广场舞等娱乐、社交活动,我们与岳母商讨的应对方式是周末给她放假,周五晚上返回老家岳阳县,周一早晨在我们上班前赶到长沙。

这样来回奔波的确挺累,也增加了不少额外交通费用,就连岳母的朋友也觉得她“折腾”,可像大家上班都期盼周末一样,带娃的老人同样需要休息,周末假期不仅让老人暂时得以解

脱,也能让她回到熟悉舒适的环境中,在精神层面得以小憩,这对于她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

当然,能周末休假的“老漂族”不多,有些是因为周末也要带娃,有些则是老家距离遥远,往返费时费力费钱。可不管是哪种形式漂在城市,老漂族的眼前困境与长远问题都有必要引起重视,并逐步得以改善和解决。

作为受益者,子女除了保障物质层面的供给外,也需要给老人提供更多精神层面的慰藉,不能将全部精力放在下一代而完全忽视了他们的心理、情感需求,更不能将老人当成带娃的“工具人”,而要帮助老人更好融入新的家庭、新的生活环境。而城市管理者、社区组织等,要为老漂族出行、就医、社交、娱乐等提供更好保障,让他们感受何为“城市生活更美好”。

老漂族与北漂、深漂等一样,其实也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的产物,促进城乡、区域均衡发展,让更多年轻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是减少老漂族的重要途径之一。此外,则是要在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等方面,为年轻父母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普惠性资源。否则,随着三孩政策的推进与生育意愿的提升,更多老人只能前赴后继成为“老漂族”,且带完老大可能还有老二、老三,时间、精力消耗对老人而言都是不小挑战。

在本该享受退休生活的年纪,却只能退而不休,成为身心俱疲的“老漂族”,这对老年群体而言显然不公平。尽管问题的解决无法一蹴而就,但老漂现象和老漂族群体面临的种种困境,不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淹没,逐步改善解决,最终实现标本兼治,是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 边丽娟

随着我国向制造业强国发展,蓝领技术岗位日益受到重视。然而,《中国青年报》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愿成为“蓝领”。在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还应更多考虑学生对未来职业生

涯的规划。作为一名职业院校教师与班主任,通过与学生的日常接触,我一方面了解到,大部分学生对将来的职业发展都缺乏明确规划;另一方面也在观察中发现,学生不愿选择技术岗位,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首先是社会因素的影响。目前在学校的

职业院校学生,年龄普遍在15-22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个别不是独生子女的,也是家庭中的弟弟或妹妹。这些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处在“一大家子人围着一个孩子转”的环境中,习惯了较为优越的生活,动手干活儿对他们来说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看起来又脏又累的蓝领岗位对他们自然缺乏吸引力。

近年来,国家着重发展互联网经济,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人们接触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赚钱的门路也越来越多。对于职业院校的学生,他们如果心思活络,具备一定的学习适应能力,不难为自己找到比成为蓝领技术工人更赚钱的去向。毕竟,对大多数并非顶尖水平的职业院校学生而言,技术工人的工资无法满足他们的收

入期待,改行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除此之外,家庭因素也对学生有所影响。职业院校相对于本科院校而言,录取分数线低。目前职业院校的招生录取形式多为3+3、3+2。对于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能够借助职业教育取得大专文凭,在其家庭看来是较有性价比的选择。不少将孩子送入职业院校的家长,只是希望自家孩子能够有学上、有人管,不在社会上闲混惹事。真正让孩子学习专业技术和本领,对这些家长来说并不是最终目的。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大部分家长也没有很好的规划,但在潜意识中,他们普遍希望孩子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而蓝领工作在